

“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思想的互动研究*

——以20世纪20—40年代为考察范围

王朝庆

[摘要]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化”思潮的流行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的基本面相。一方面,“中国化”思潮不仅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提供了主体要件和基本的思考路径,为其营建了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及后来该命题在党内的明确提出,不仅确立了“中国化”思潮的正确发展路向,而且还丰富了它的理论内涵,促进了其质的飞跃,大大拓展了“中国化”思潮的新视野。“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有效互动,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一幅生动的历史图谱,这为我们当前建构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带来若干思考。

[关键词] “中国化”思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 互动研究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18.04.02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它的生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理论酝酿与升华的过程。其中,20世纪20年代前后兴起的“中国化”思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①而言,不仅为其提供了必备的主体要件与基本的思考路径,而且也为其营造了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然而,思想的逻辑演变理路并不等同于单向度的实物传递,它往往需要在互动交流中实现发展与升华。“中国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生成而言,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语境动因;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若干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BKS034]、上海市学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成逻辑和价值意蕴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本文中所提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既包括毛泽东于1938年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同时也包括1938年之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知。由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成熟形态,它的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因此本文将重点围绕“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关系进行考察与探究。

的形成反过来又促进了“中国化”思潮的深入发展,二者表现为一种双向互动的辩证关系。

目前,关于“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互动的研究,学界主要有李方祥、张世飞等学者对此作了初步的尝试^①,他们分别从不同的时间段出发,考察和描绘了“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互动的历史图景。然而根据新史学的观点,“历史的发展时快时慢,但推动历史发展的内在力量却只有在长时段中才能起作用并被把握”^②。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始终相互纠缠、互相交织,从“中国化”思潮之发端,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之生成,再到后来“学术中国化”运动之开展,三者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逻辑演变关系。从历史的“长时段”出发,对它们的内在关系进行整体式的宏观把握而不是断层式的割裂研究,无疑更能反映和揭示这一时期思想界的历史图谱。鉴于此,在遵循“‘中国化’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学术中国化’运动”这样一个互动的逻辑理路基础上,本文拟对该问题作进一步梳理和探讨。

一、“中国化”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推动与发展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能否在一个国家实现以及多大程度上实现,归根结底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响声中传输到中国的,因此不可避免地要面临如何“满足中国的需要”这样一个难题。而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化”思潮,恰恰为破解这个难题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温床。换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产生,与这一时期流行的“中国化”思潮须臾不可分离。

(一)“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生成提供了主体条件

20世纪20年代前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蔡和森、张太雷、李达等人在接触马克思主义之时,就初步产生了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的朴素想法。这种

想法,尽管从表面看来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但从深层次来看,却是受到五四运动以来“思想界、学术界引进外国学说应该‘中国化’的思路影响的结果”^③。

以李大钊和毛泽东为例。李大钊不仅是早期系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第一人,而且也是倡导“中国化”思想的先锋。早在五四前后的“主义”之风盛行之时,李大钊就已经萌发了“中国化”的思想。比如,1913年9月,李大钊就提出中国在学习借鉴西方的政治制度时,决不能为了“与彼相符”,而“置吾国情于不顾”。^④1918年7月,在与友人高元君讨论“强力与自由政治”问题时,李大钊强调,“吾辈立言,不察中国今日之情形,不审西洋哲人之时境……殊虑犯胡适之先生所谓‘奴性逻辑’之嫌,此为今日立言之大忌”。^⑤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李大钊虽没有明确使用“中国化”这一概念,但他所提倡的外国制度、主义和学说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思想,对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来说,无疑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之后,在介绍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进程中,尤其是在与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中,李大钊对“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问题的认知更加清晰和深刻。1919年8月,在给胡适的复信中,李大钊强调:“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⑥这种理念和观点,明确体现了李大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主张将其运用于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后来,他在北京大学讲授《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课程时又指出,社会主义“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

① 参见李方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学术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载《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2期;张世飞《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潮互动》,载《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2期。

② [法]勒高夫等主编《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③ 张世飞《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与形成标准——兼与张远新等商榷》,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④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95页。

⑤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01—302页。

⑥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1页。

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①。很显然,李大钊在这里已经明确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即中国未来的社会主义应合乎中国之情形,是异于其他国家而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

在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毛泽东应该说是比较“特殊”的一位,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与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人都有留学的经历不同,毛泽东是受“中国化”思潮的浸润,完全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而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此外,在生动的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通过对中国革命问题与形势的调查和思考,撰写了大量的关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著述。在这些著述中,他特别强调,要实现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彻底胜利,只有依靠那些了解中国具体情况的中国同志,否则就要“碰壁”。同时,他还援引斯大林的话说:“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②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始终把实践放在第一位,他坚持“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③的逻辑运思,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作“行动的指南”“革命的科学”以及“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④正是在这样“实践—理论—实践”^⑤的互动中,毛泽东最终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也就势所必然。在1938年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谈到“学习”时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⑥由此,从李大钊到毛泽东,经过几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终于在党内被明确提了出来,经过“学术中国化”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这一命题迅速在全党形成了统一的思想共识。

(二)“中国化”思潮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生成营造了文化氛围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企图在政治上掌控中国主权,经济上掠夺中国的财富资源,军事上侵吞中国领土,甚至还企图“用种种方法想毁灭我们的文化,使我们在文

化上也要成为他们的奴隶”^⑦。这无疑严重加剧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和文化危机。在各种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形势下,中国思想界普遍高扬“中国化”的旗帜,接连发起了一系列的文化“中国化”运动,如新启蒙运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延安革命文化运动等。这些文化“中国化”运动的普遍开展,毋庸置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终产生营建了浓厚的思想文化氛围。下面我们以1935年兴起的新启蒙运动和1937年兴起的延安革命文化运动为例进行考察。

其一,新启蒙运动的兴起,是日益加深的民族危机在文化上的剧烈反映。张申府曾指出:“今日是中国团结救亡,民族解放,争取自由,民主政治的时代。今日的新启蒙运动,就是适应这个时代的思想方面,文化方面的运动。”^⑧这表明,新启蒙运动的实质就是“文化上的救亡运动”^⑨。而为了“文化救亡”,构筑起中国民众强大的“精神国防”,新启蒙运动者在一开始便确立了自己的信仰,即“反对异民族的奴役,反对礼教,反对独断,反对盲从,破除迷信,唤起广大人民之抗敌和民主的觉醒”^⑩。

在该运动进程中,新启蒙运动者明确提出了“中国化”的诉求,他们主张“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⑪。这种新文化必须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大众

① 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9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⑤ 陈红娟认为,由于毛泽东思考中国革命的逻辑是“通过实践反思理论,通过理论对照中国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反复切换”,因此毛泽东是属于“实践—理论—实践”互动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参见陈红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要素研究——基于陈独秀、瞿秋白和毛泽东的比较》,甘肃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64—67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4页。

⑦ 艾思奇《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载《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19期。

⑧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1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⑨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载《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2期。

⑩ 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载《读书生活》1936年第4卷第9期。

⑪ 何干之《新启蒙运动与哲学家》,载《国民》(上海)1937年第1卷第13期。

性。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具有显著民族性和大众性的新文化呢?在新启蒙运动者看来,其基本的方法理路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①比如陈伯达就曾明确指出,新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即是在当时思想界占支配地位的“动的逻辑”,“动的逻辑之具体的应用,将成为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中心,而且一切问题,将要借助于动的逻辑,才能作最后合理的解决”^②。后来,他更是向中国哲学界呼吁,应该把新哲学应用到中国具体的问题上去,“使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问题中具体化起来,更充实起来”^③。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伯达已酝酿并形成了唯物辩证法大众化、中国化的致思取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张申府还提出了“科学中国化”的主张,他认为,在推广科学上,“不但要中国科学化,同时也要科学中国化”^④。

虽然新启蒙运动历时较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新启蒙运动者便纷纷离开北平、上海等地,迅速投入到抗日救亡的革命洪流中去,并没有来得及形成一个大规模的文化运动,但尽管如此,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依然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场运动中,由于“通俗化”“中国化”等口号的大力高扬,不仅使滥觞于“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化”思潮的内涵更为明确与丰富,而且也促使马克思主义者更加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如后来有论者指出:“随着新启蒙运动的到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⑤

其二,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动员全民族抗战救亡,积极配合政治上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全国发出了进行革命文化运动的号召,提出建立民族文化统一战线的政治要求。毛泽东明确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的文化工作者,就是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⑥

延安革命文化运动即是在这样的政治号召下最终形成的。在延安革命文化运动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和党内理论工作者非常重视民族新文化的建设,强调文化运动的“中国化”。1937年

底,从贤发表了《现阶段的文化运动》一文,在该文中,他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不能成为大众文化,就是因为“外国气味实在太重了”。因此,他强调:“现在要加紧文化的大众化运动,就是要使这运动真正成为中国广大民族的文化运动,要使我们的文化运动充分中国化!”^⑦这表明,在“从贤”那里,文化运动要大众化,首先就应该充分地中国化。1938年5月,柳湜同样强调文化应该实现中国化,在他看来,尽管中国应该积极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文化,但在这一过程中必须“要融化它,要中国化它”^⑧。另外引人注目的是,这一时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张闻天也意识到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指出:“主要原则是理论与实际一致,事实上这一点做得很少,理论一定要与实际联系,要中国化。”^⑨在这以后,“马列主义具体化中国化”的思想便经常出现在张闻天的文章和谈话中。而正是由于张闻天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的思想,到1938年在党内逐渐形成了普遍共识,这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便势在必行了。^⑩

在全民族抗战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中国化”思潮可以说得到了空前的高扬。该思潮流行的盛况,后来有学者曾这样描述:这里到处充满和体现了“中国味”“中国化”“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五四时期的“世界化”口号早已无所遁形,人们再也无需担心“中国人”会被世界所抛弃。^⑪应该指

① 在新启蒙运动者那里,唯物辩证法有时也被称为“新哲学”或“动的逻辑”,见下文。

② 陈伯达《论新启蒙运动——第二次的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救亡运动》,载《新世纪》1936年第1卷第2期。

③ 陈伯达《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议》,载《读书生活》1936年第4卷第9期。

④ 张申府《张申府文集》第1卷,第350页。

⑤ [美]怀利《毛泽东、陈伯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1936—1938)》,林育川译,载《现代哲学》2006年第6期。

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8页。

⑦ 从贤《现阶段的文化运动》,载《解放》1937年第1卷第23期。

⑧ 柳湜《抗战以来文化运动的发展》,载《战时文化》1938年第1卷第1期。

⑨ 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342页。

⑩ 参见李兴主编《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教学用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8页。

⑪ 参见冯崇义《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化思潮》,载《开放时代》1998年第2期。

出,在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何炳松、孙寒冰等十位教授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宣言”,还是陈伯达等人发起的新启蒙运动,抑或是之后的延安革命文化运动,它们都最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路向上实现了交汇。正是由于中国思想界为抗战救亡而孜孜不倦的理论探索,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最终提出,准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营建了浓厚的文化氛围。^①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化”思潮的引领与升华

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化”思潮发端以来,不同的政治思想派别都有着各自的“中国化”主张。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不仅是“中国化”思潮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更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经过艰难探索而最终得出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践内在关系的科学认知。正是在这种科学认知的指引下,“中国化”思潮才能够最终沿着正确的路向发展。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为“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奠定了政治基础

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不仅要求全党必须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而且还首次正式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仅为问题的一方面,而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他要求“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②。随后,陕甘宁边区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竞赛运动。

正是在这次学习竞赛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号召下,“学术中国化”的口号被一些理论工作者明确提了出来,并随即在学术界发展成为一个理论运动,各个学术部门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参与了进来。至此,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推动下,绵延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化”思潮可以说达到了一个顶峰,由理论“思潮”而发展为实践“运动”。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时人普遍看来,1939年开始的“学术中国化”运动,正是由于

毛泽东所提出的“命题”和“任务”而引发的。1939年,柳湜就曾在《论中国化》一文中明确指出:“新学术运动是发生在中国抗战的形势下,新的环境,将学习理论提到了重要地位,学习理论成了抗战胜利的条件。这是新学术运动在近日发生的根据,也就是‘中国化’口号首先在这里被提出的缘故。”^③

不仅如此,就连一些自由主义者甚至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也对此予以了肯认。比如,徐荻权就曾在《学术中国化问题之检讨》一文中认为,“自毛泽东氏《论新阶段》一书出版以后,从今年四月起,开始有了‘中国化’的呼声”^④;叶青也多次慨叹道:“从今年四月起,有了‘中国化’底呼声。这当然在毛泽东底同志所编的刊物上……他们想使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史中现阶段底任务而造成一个划时代的文化运动。”^⑤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提出的具有浓厚政治意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为“学术中国化”运动的开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正如有论者所指出:“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到‘学术中国化’运动的正式发动,两者之间不仅存在着时间上的前后继起性,而且存在着因果上的内在关联性。”^⑥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三民主义儒学化”的超越

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濒临灭亡的严重危机下,“中国化”思潮成为社会各界抗日救亡的一面鲜明旗帜,它不单单表现为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而且还主要体现在对国民党人所宣扬的“三民主义儒学化”。

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戴季陶是“三民主义儒学化”的首倡者。他坚持否认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多元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将其完

① 参见王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源语境》,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3页。

③ 柳湜《论中国化》载《读书月报》1939年第1卷第3期。

④ 徐荻权《学术中国化问题之检讨》,载《时论分析》1939年第14期。

⑤ 叶青《论学术中国化》,载《时代精神》1939年创刊号。

⑥ 姚宏志《毛泽东与抗战时期“学术中国化”运动》,载《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全说成是对儒家学说的继承和发展。在他看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是“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①。此外,他还断言,孙中山在“随时随地,都尽力鼓吹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真义。赞美中国固有道德的文化的价值。说明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②。全面抗战以来,同样沦为国民党右翼的蒋介石,将“三民主义儒学化”这一错误思想继续贯彻到底。蒋介石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陷入如此贫弱落后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不自信。他曾反复说道:“民族盛衰关于民族的自信力甚大。如果能够自信,我们有文化的自信力,中国的文化是可以救国的,我们的文化在世界上最优秀,当然可以建立我们的大中华民国。惟必须有这样的自信力,才能够复兴中国,才能够创造中国未来的文化。惟其能够创造文化,发展文化,我们今后才有民族的自信力。”^③很显然,在蒋介石那里,旧民族文化就是中国最优秀的“传统道德文化”。不仅如此,他甚至还宣称,“中华民族固有的德性”是中国之“国魂”,只有把这个“国魂”积极融入自己“灵魂”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就是要恢复传统的“正统礼法”,以此来反对“由外而入”的共产主义思想。

针对上述国民党右翼分子对三民主义的修正与歪解,中国共产党人针锋相对,给予了严厉的批评。比如,王稼祥就指出,“儒学化”的三民主义完全“抛弃了孙中山基本革命的主张,在三民主义的最主要的问题上都是修正了和曲解了孙中山的基本立场”^④。周恩来也批评道:“从蒋介石这一切思想体系中,我们只能看出中国法西斯主义,决看不出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孙中山的思想中的唯心观点、消极因素,被蒋介石拿来发展成为他今天的思想体系。”^⑤

应该说,在国共双方激烈的理论较量中,抛弃了孙中山思想中合理部分而过分夸大“儒学”地位的三民主义,其理论内容显然是没有说服力和号召力的,这种“假三民主义”当然糊弄不了开明的知识分子及人民大众,甚至连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胡汉民对此也大不以为然,他说:“假如孙中山的要求和思想,只是继承尧舜,使中绝的中国道

德文化复活,那么,孙中山便够不上是一个革命家或政治家。只能算是一个普通的伦理道德家,或一个普通的学问家。”^⑥至于中国共产党人,则是真正地继承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实现了“三民主义”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建立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无疑表征着在抗战时期“中国化”思潮的路向发展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三民主义儒学化”的超越与彻底胜利。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拓展了“中国化”思潮的新视野

五四以来,在“中国化”思潮的发展过程中,由于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语境的转换,“中国化”本身的内涵也在不断地转化和提升。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生成,更是拓展了“中国化”思潮的新视野,开辟了“中国化”思潮发展的新境界,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丰富了“中国化”思潮的内涵。自1938年10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正式提出以后,无论是在表征形式上,还是在方法理路和内容逻辑上,都极大地丰富与提升了绵延于五四以来的“中国化”思潮的理论内涵。

一是在表征形式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强调民族形式和大众化、通俗化。任何一个外来理论,若要实现其“中国化”,一个基本前提必须首先使人民大众理解和掌握该理论,理论的大众

①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六续)》,载《民国日报·觉悟》1925年第8卷第3期。实际上,三民主义最早是由孙中山先生在《民报》发刊词中提出来的,它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即“中国的传统思想;西方的民主思想;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孙中山本人也曾承认:“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参见彭明、程歆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5页;《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页。

② 戴季陶《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续)》,载《来复》1927年第457期。

③ 转引自彭明、程歆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第592页。

④ 王稼祥《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3页。

⑤ 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50页。

⑥ 转引自彭明、程歆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第573页。

化和通俗化是实现“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①。二是在方法理路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主张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考察实际问题，强调要正确处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②三是在内容逻辑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不仅要求透彻地吸收“原生态”和“次生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更应该创造中国化的和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在党内的产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复杂的革命环境中，所创造出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可以说是滥觞于五四时期的“中国化”思潮的最终成果。它不仅彻底地厘清了“中国化”的概念，同时也引领着“中国化”思潮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促进了“中国化”思潮质的飞跃。五四前后，“中国化”思潮的萌发与流行，主要体现在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术领域内。然而，真正在革命实践中践行“中国化”理念的，应归之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尤其是193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从根本上促使“中国化”思潮实现了质的飞跃，即由学术层面的自省开始走向政治层面的自觉，由党外的零散号召逐渐发展为党内的政治学习运动。

自毛泽东在党内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不再只是某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呼吁，而是全体中国共产党人都必须执行的任务”^③。由此一来，全党便掀起了一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心的学习运动，即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其实就是一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运动。”^④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不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获得了广大党员干部的普遍认同，成为全党的共识，而且在全党范围内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另外还大大地提高了全体共产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修养，这正如后来杨尚昆所说，“在这段时间内，我确实读了不少书，马列的和毛主席的不必说，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同志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也是必读的”，“整风对我来说确实有很大收获，那是从来

没有经历过的”。^⑤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产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化”思潮的内涵，实现了“中国化”思潮在“质”上的升华，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全党指导地位的确立，规定了党正确的革命策略，引领着中国革命斗争的方向，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真正意义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三、“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互动的现实启示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化”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互动，可以说构成了当时中国思想界一幅生动的历史图谱。两者互相启发、互为动力，不仅推动了中国思想界在理论和观念创新上的进步，同时对于抗战救亡也有着特殊的实际贡献，这为我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思考。

其一，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引领。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⑥。在20世纪20—4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以其特有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最终在“中国化”思潮的竞流中脱颖而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使“中国化”思潮渐趋统一，而且也使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历史已有力地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改造中国、发展中国唯一正确的理论，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来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这是由马克思主义自身具有的真理性 and 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所决定的。

① 艾思奇：《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载《自由中国》1938年创刊号。

② 参见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载《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

③ 冯崇义：《国魂，在国难中挣扎——抗战时期的中国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3页。

④ 高九江、韩琳：《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7页。

⑤ 杨尚昆：《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8、212页。

⑥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728页。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日益加深,来自西方的一些错误思潮逐渐渗透到中国,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普世价值论”等逐渐在思想文化领域占有一定的市场。可以说,这些错误思潮无异于当今时代的“精神鸦片”,肆意地侵蚀着人民群众尤其是新青年一代的思想认知。针对以上种种错误思潮,我们必须认清其利害关系,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各种社会思潮中的引领地位,不仅要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心聚力形成共识,更要客观正确地对待历史和英雄人物,科学阐释马克思主义的真正要义;不仅要讲好“老祖宗”的老话,更要敢于说“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形成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才能使历史虚无主义、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等错误思潮趋于破产,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廓清障碍。

其二,学术研究应与意识形态保持适度的张力。“五四运动”以来,关于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内在关系,学术界大致呈现如下两种观点:一种是“为学问而学问”^①,学问应远离政治;另一种是“学术要严格配合政治”^②,为意识形态服务。前者毋庸置疑是不现实的,因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往往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学术不可能彻底摆脱政治而独立存在。后者则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因为抗战需要有相应的“抗战文化”,所以学术要为意识形态服务,这一观点和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观点和做法并不具有普适性,在当今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它决不是处理学术与意识形态关系的正确选择。

那么在今天,究竟应该以何种态度对待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呢?这就是应该使两者保持适度的张力。一方面,必须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正确认识事物。当然,我们并不是要依靠简单的说教,也不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塑造成“高深学问”的形象。恰恰相反,而是应该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入浅出的阐释,使其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大众化和通俗化,树立“为人民而学问”的研究态度和研究宗旨。这样才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服人,促进人民树立

对该理论的认同与信仰。另一方面,学术研究必须有一定的自由空间,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唯有如此,学术才能够进步和繁荣。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③这清楚地表明,学术研究将迎来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活跃的自由空间,在这样比较自由的学术氛围下,学术研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必然能够得到正确处理,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定能够繁荣发展。

另外,值得思考和关注的问题还在于,在全球化空前盛行的今天,不仅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逐渐融为一体,而且这些民族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学术切磋也日渐紧密。对于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范式、学术成果以及理论体系,这当然有利于我们学术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清国情,必须坚决避免“五四运动”时期那种简单照搬和移植的简单做法。在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理论的同时,必须努力建构和形成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只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真正在世界的舞台上拥有文化和学术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从而为人类的学术进步和文化繁荣做出应有的贡献。

(王朝庆: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成军)

- ① 这主要体现在以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新派史学家”身上。他们认为,做学问是为了“求真”和“增进知识”,而不是为了“实际应用或培养人格”。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版第418页。
- ② 这主要体现在以翦伯赞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身上。他们认为,任何学问都必须为政治服务,“史家要与现实的政治斗争紧密结合,史学著作应该成为‘战斗指南’”。参见上书,第477页。
- ③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页。